

論文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下）

——中国交际文化谈（五）——

張 筱 平

要 旨

外国人とのあいだで、円滑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もつためには、相手の言語について一定の能力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はもとより、最も重要なのは相手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を理解することである。中国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も例外ではない。これはつまり私たちが中国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を論じることの目的でもあ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の内容は非常に幅広く、社会学では“三缘关系（三つの縁にもとづく関係）”という言い方があり、“血缘关系（血縁による関係）”“业缘关系（仕事・職業・学業などさまざまな“業”による関係）”“地缘关系（地縁による関係）”の三つに大別される。この三つの“关系（関係）”のなかでも内容が最も複雑である“业缘关系”に焦点をあて、外国人が最も接触する機会の多いものから、“官民、师生、朋友、同事、主客、临时（官と民、教師と学生、友人、同僚、主客、臨時）”の六つの場合を取り上げて考察する。紙幅に限りがあるため、考察を二編に分けて展開し、本稿を考察の後半部分で（下）とする。

キーワード：业缘关系（仕事・職業・学業などさまざまな“業”による関係）、交际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文化）、朋友（友人）、同事（同僚）、主客（主客）、临时（臨時）

一、前言

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我们已经在《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一文中讨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对中国业缘关系交际的影响和作用，并对中国官民关系和师生关系做了粗略的考察分析¹⁾。本文是该文的下半部分，主要围绕朋友、同事、主客和临时等四种人际关系进行考察、分析，以使学习汉语并希望用汉语与中国人交往的日本人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文化，提高与中国人业缘关系的理解能力和交际能力。

二、朋友关系

把现代汉语的“朋友”翻译成日语的“友達”，日本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首先想到“同学”，除此之外，工作了的人还会想到“同事”。其实，汉语“朋友”一词在古代中国，本来就有“同学”和“同事”含义的。所谓“同师为朋、同道为友”，前者指的就是“同学”，而后者解释为“同事”也无不可。只是后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同学”和“同事”的概念后，“朋友”一词才与其区别开来，各司其职，泛指“交谊深厚的人”了。

“朋友”一词在中国还有一个义项是日语对应词“友達”所没有的，那就是很多时候可以特指有恋情的情侣、恋人。但是，这一意义的“朋友”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朋友关系”中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列了。

中国学界在讨论“朋友”话题时，往往都会引用孔子的一句话：“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²⁾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一般都解释为：“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实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走歪门邪道的人交朋友、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毫无疑问，该解释把孔子说的“友”理解成了“朋友”。那么，孔子在《论语》开篇的一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³⁾其中的“朋”字又作何解释呢？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也还是解释为“朋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两处都是“朋友”的概念，为什么孔子非要用两个不同的词呢？显然，在孔子看来“朋”和“友”还是有区别的，并不能完全和现代汉语意义的“朋友”等同起来。在我看来，这里用“同师为朋、同道为友”来分别解释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孔子很重视“朋”关系，同师之“朋”从远方来访，当然要以隆重的礼乐迎之⁴⁾。而对于同道之人的“友”，孔子将之分成两类，亦即“益友”和“损友”，意在告诉人们：“益友”正直、诚实、见多识广，是“君子”，值得深交，可以结为朋友。而“损友”言行不端，同道而不能同德同心，是“小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结为朋友的。因此“友”在这里还不是“交谊深厚”意义上的朋友，作为“小人”的“损友”就更不能说成是朋友了，即使其在“同道之人”中一时找到朋友，然而一旦被发现其真实面

目, 必然还是会被排除到朋友关系之外的。当然, “益友”作为“同道之人”中的“君子”, 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好朋友”之列, 自然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了。

中国人在现实中很重视朋友关系。在中国人看来, 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是离不开朋友的。“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一道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仇人少堵墙”, 这些俗语在民间代代相传, 其耳熟能详的程度足以说明朋友关系在中国人心里的分量。这是中国儒学文化构筑和希望的结果。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 中国儒学文化之所以主张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四组人际关系之外, 再加上“朋友”关系构成“五伦”⁵⁾, 其本身就说明了“朋友”关系的重要性。这种设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合理需求, 应该说是很人道和人性化的, 对中国社会形成重视“朋友”关系的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对“朋友”特征的认识, 应该说跟日本人差不多。我们如果从“朋友”这两个字的写法上分析, 也可以意会到一些。“朋”字是两个肉月(或肉身)组成的, 表示出相互平等相互依靠之意;“友”字是由左右两只手组成的, 表示出共同协作互助之意。这种理解应该说是无道理的。如果根据现实分析, 我们还可以至少补充这样几点: 第一, 朋友既然是平等的, 那必然也是自己选择或认同的, 不是强迫的。在儒学文化传统的“五伦”中, 只有朋友关系是自主认定的, 即使有来自外力(比如父母之命)而被称做朋友的, 自己内心不认可的话, 也不会认作朋友。第二, 朋友既然是平等的, 那也一定是自由的。这也是儒学文化传统的“五伦”所规定的, 是唯一没有上下尊卑等级约束的, 尊重彼此各种合法合理权利的人际关系。第三, 朋友既然是互相依靠与合作的, 那也一定是有共同之处, 合得来的。所谓“志趣相投”也好, “志同道合”也好, 没有共同之处就不会合得来, 也就不能称其为朋友了。当然, 这种共同之处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标准, 是因人而异的, 因而也就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一旦失去了共同之处, 甚至走向了反面, 形成了对立, 朋友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第四, 保持着非同一般人的、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时能够互助合作的深厚友情。这一点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在中国人看来, 没有友情就不叫朋友, 朋友在需要帮助或合作的时候而不情愿伸把手, 也不能叫朋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埋怨对方“不够朋友”, 其意义就在于告诫对方没有达到做朋友的标准, 违背了做朋友必须讲友情重互助与合作的准则。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告诫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话, 朋友之间的关系便会因此而渐行渐远, 甚至破裂也是极有可能的。

下面, 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人对朋友类别的认识。

第一, 以性别而论的异性朋友。传统的中国社会, 由于“男女有别”, “男女授受不亲”, 非亲缘关系的异性之间交往很少, 因而也就很少有什么异性朋友。进入现代社会后, 社会制度进步了, 社会思想开明了, 中国人男女之间交往自由平等了, 因而有异性朋友也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儿了。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但是, 对于异性朋友, 现代的中国人一般都认为, 除了在相处礼节方面有些特殊以外, 其他方面与同性朋友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而在语言称谓和表述上

也就无须特别地冠以“男”“女”，加以区别了。反而，如果特别冠以“男”“女”的，比如“男朋友”“男友”和“女朋友”“女友”等，在中国人看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是特指具有恋情的情侣或恋人了。这一点，是日本人应该引起注意的。当然，异性朋友如果深入发展是很容易越界成为情侣或恋人的，这就超出了朋友的范围，成为另外的话题了。

第二，以时间而论的朋友。中国人交朋友是不在乎年龄差距的，年龄差距很大的朋友叫做“忘年之交”，年龄大的一方可以称年龄小的为“小朋友”，但年龄小的一方称呼年龄大的，一般都用家庭称谓，如“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等。“忘年之交”，其结交本身一般都具有令人感动的背景故事，得来不易，独特稀少，因而很受人们的敬重。另外，从小在一起长大称作“发小”的，女孩子可以称作“闺蜜”的，两个家庭人员世代友好被称为“世交”的，以及被叫做“故友”“故交”“老朋友”的，这一类朋友的特点就是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一直保持友情不变，因而自然也是中国人所珍视的。对于结交时间比较短，或者接触时间和交往的机会比较少的朋友，比如“半面之交”“一面之交”“点头之交”等等，中国人一般也都喜欢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希望有机会合作互助，加深友情。

第三，以职场上的共同身份而论的朋友。比如学友（一起上学期间结交的朋友）、校友（同一所学校学习过的朋友）、工友（在相同职场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战友（在同一部队一起战斗过的朋友）、室友（在同一个宿舍房间长期居住过的朋友）等，由于接触时间和互助的机会多，共同之处比较明显、稳定，因而很容易产生深厚的友情，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往往也大多出自此类。

第四，以共同个人情趣而论的朋友。比如票友（爱好戏剧表演的戏迷朋友）、笔友（爱好文学创作的朋友）、牌友（喜欢一起玩儿扑克牌、打麻将牌的朋友）、棋友（喜欢一起下棋的朋友）、网友（在网上结识并喜欢在网上一起互动的朋友）、微友（在微信上结识并用微信互动的朋友）、舞伴（经常一起结伴跳舞的朋友）等，对这种有着一般趣味或比较高雅趣味的朋友，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结交，特别是退休之后的中老年人群。但是，有一些被普遍认为是低俗趣味的爱好者，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为人所不齿了。比如酒友（喜欢一起酗酒作乐的朋友，贬义词也称“酒肉朋友”）、赌友（喜欢一起赌博的朋友）、嫖友（喜欢一起嫖妓的朋友）、炮友（新词，特指没有爱情的性伴侣）等。这些喜欢低俗趣味的朋友之间，关系很脆弱，很容易“大难临头各自飞”，对这类人，正常的人们往往很鄙视，常常用贬义的成语“狐朋狗友”来形容。

第五，以信仰相同而论的朋友。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因而党员之间，在正式的场合一般都互称“同志”，取“志同道合”之意。在他们看来，这种“同志”的关系既是朋友，又胜似朋友。但就日常生活中个人之间的交情而论，还是因人而异的，不能统统看作是朋友。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教民之间，在涉及宗教的场合，一般都被称作“教友”。但就个人而言，这种“教友”，是不是有交情，也因人而异。如果有交情的，在表述时，恐怕还要加上“朋友”，比如“他们既是教友，又是朋友”。可见“教友”所含

的朋友概念并不那么清晰。

第六，以相识时的偶然性背景而论的朋友。比如难友（因某种灾难而结识的朋友）、病友（因生病住院而结识的朋友）、狱友（因入狱而结识的朋友）、驴友（“旅友”的谐音词，旅行中结识的朋友）等。这一类朋友，说是朋友，实际上具有临时性质，缺少稳定性，一旦时过境迁，除非保持继续交往进入朋友圈，一般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疏远的。

第七，以结交时的社会地位低下而论的朋友。比如“贫贱之交”（在共同贫穷状态下结交的朋友）、“布衣之交”（一般平民百姓之间的朋友）等。这一类的朋友因为生活在社会下层而往往很重视“苟富贵勿相忘”，更崇尚朋友之间互助的“义气”。

第八，以友情程度而论的朋友。友情程度一般的，属于“泛泛之交”，称作“朋友”时，往往不加什么修饰。友情程度比较深的，民间说“可以掏心窝子说心里话”的，成语叫“肺腑之交”的，一般都会称为“挚友”“至友”“诤友”“密友”“志友”“执友”“良友”“益友”等。友情很深的，民间称为“铁哥们儿”“铁姐妹儿”，雅称是“知己”“知心”或“知音”，一般认为非常稀少。俗话说“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知音自古称难遇”日本朋友所熟悉的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生前曾书写过一句清代文人何瓦琴的名句送给他的好友瞿秋白先生，该诗句也因鲁迅的引用而更为流传深广，那便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知己”“知心”“知音”之稀缺珍贵。但是，如果论友情程度的话，这还不是最深的。做为朋友，友情最深的一类当属“患难之交”“生死之交”“刎颈之交”“过命之交”，这些成语的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指经过生死考验并可以为友情献出生命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很多都会结拜为“异姓”兄弟姐妹，不仅从此按年龄大小以“兄弟姐妹”相称，还要誓言“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此种行为被称为“金兰结义”，经过这种结义的朋友关系被叫作“金兰之交”，应该说是朋友友情最高的表现形态。日本人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就是这种关系。不过，自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生死”问题很容易触及法律底线，因而这种结义的朋友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对一般人来说，还是身边能有几个“知己”“知心”“知音”是最好的状态，也是最令人安心满足的。

那么，中国人是怎样和朋友交往的呢？换言之，中国朋友之间有什么样的交友之道呢？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中国人结交朋友所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一般中国人都知道的“信”字。我们在讨论血缘关系的时候曾经引述过儒学文化“圣人”之一的孟子所说过的一段话，“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⁸⁾。最后一句的“朋友有信”的“信”字，正是这一原则。“信”就是“诚实不欺，讲求信用”，就是“言必行，行必果”。孔子把“信”作为君子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认为只有做到了“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因此，处世为人要结交朋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讲究“信”字了。这是儒学文化给中国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直至今日也毫无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和宋代之间，在浙江一带出现了一个吴越国，君主叫钱镠（Qián Liú 公元852-932），他为家

人留下了一部著名的《钱氏家训》。后来，钱家成了一个大家族，出了很多名人⁹⁾，其中原因据说就与这个家族一直严格遵照《钱氏家训》治家密切相关。该家训分为四节：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其中“社会”一节第一句就是“信交朋友”。这里显然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结交朋友是融入社会立足建业的首需；第二，朋友交往要以诚信为重。而包括这一内容的《钱氏家训》流传至今仍然被视为钱家至宝，并且早已在中国社会流行，说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当然也包括“信交朋友”所展示的“信”的道德原则，也就是中国交友之道的第一要义。

其次，中国传统儒学文化所倡导的“忠恕”也是中国人交友之道所必须坚持的要义。所谓“忠”，就是“忠诚”“忠心”。对朋友要诚心诚意，忠诚可靠，不能猜忌，更不能背叛。朋友有了错，要出于善意，敢于和善于劝告。不能因为害怕得罪朋友而任其错误发展。朋友遇到难事，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朋友。所谓“恕”，就是“饶恕”“原谅”。对朋友要宽厚，与朋友发生冲突，要懂得妥协退让，不能苛求朋友完美无缺，朋友有错，要主动释怀，原谅对方。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有个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很多日本人都都不陌生。做了赵国宰相的蔺相如并没有因为大将军廉颇的傲慢无礼而生气，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再忍让妥协，终于感动了廉颇，两个人最终成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是中国学生必学的国语课文内容之一，其所含的“忠恕”思想的影响不可小觑。现实生活中，以“忠恕”之道对待朋友的现象很多，这样的人也必定有很多朋友。当然也有不注意“忠恕”之道的，特别是不讲究“恕”，对朋友的过错太较真，不肯原谅。对这样的人，中国人一般都会认为其“没肚量”“不大度”，或干脆称其为“小心眼儿”。当然，这样的人，朋友自然是不会太多。

中国朋友交往之道的第三要义当属“君子之交淡如水”了。此语源于《庄子·山木》，原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意思是说“有高尚情操的君子之间的交往就像水一样纯净清澈，品德低下的小人之间的交往就像甜酒一样甘浓腻人”。中国的成年人对此语几乎无人不知，也几乎没有人不希望与朋友之间建立一种“君子之交”的关系，因此“淡如水”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人们普遍认同和追求的最佳交友境界了。所谓“淡如水”，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三个字，其实内容很丰富。人们对他的解释五花八门，但我的理解，它大体上包含了以下四层含义——

(一) 要像水一样的清淡，意指交往和求助频率不能过密。中国人一般认为，喜欢朋友和对朋友心存友谊和尊重很重要，但是为朋友着想，有君子风度的人往往都会注意控制与朋友私下交往的频率，不过多地讨扰朋友，以使朋友尽可能多地享有清静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孔子就是这样，他很喜欢交友，却不喜欢私下交往过密。他的弟子子游曾说他以为“朋友数，斯疏矣”¹⁰⁾，意思就是说过多的与朋友交往反而会使朋友疏离。也许孔子不怎么跟朋友交往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比如曲高和寡，朋友们对他过于敬畏。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古往今来恐怕还没有人特别喜爱那些总是来打搅自己，使自己不得安宁的朋友吧。当然，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

的朋友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中国人大多数也都会容忍,但是心里还是会免不了埋怨对方“不懂事”,甚至会认为“太烦人”了。这实际上就是在心理上与其疏远了。另一方面,君子交友,对求助朋友的频率也会注意加以控制,做到尽量少求朋友帮忙。中国人虽然很注重朋友之间的互助,但是同时又很注重自立自强,如果遇到问题,不努力自己去解决,而是动不动就去求助朋友,那样是很容易使朋友厌烦的。只有在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求助朋友,才是最恰当的,也会凸显朋友的价值。

(二)要像水一样清爽,意指交往中不必拘泥礼仪形式。中国人觉得有君子风度的好朋友之间是不必在意交往礼仪的,无须太多的客套,不追求形式,也不用表现得过于谦卑。每个人性格、工作、生活方式、环境、条件和情趣等等都不尽相同,因而彼此见面交往的礼仪形式还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为好。只要使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是被尊重的,心情都是舒畅爽快无拘无束的,那便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中国朋友见面的情景各种各样,既有饭店设宴开怀豪饮一醉方休的,也有登门造访敬烟敬茶畅叙友情的;既有热热闹闹欢歌笑语的,也有清清静静牵手流泪的;既有轻声细语问寒问暖的,也有高声粗气埋怨相见太少的。对于朋友之间的联系形式,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前,一般的中国人在过年过节时还很喜欢写封充满敬辞敬语的问候信或贺卡,这一形式日本民间还在坚持着,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朋友之间一般都喜欢采用电讯手段联系了,特别是利用手机微信功能中的短信、音频、视频等最受欢迎,因而,商店和邮局里过去卖得最火的节日贺卡,现在几乎很难再看到了。

(三)要像水一样清纯,意指交往目的和方法不得掺有杂质。中国人追求和向往君子之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君子之交目的和方法干干净净,坦坦荡荡,脱污浊,超功利。传统的儒学文化一直是反对将“财色”“名利”“权势”等污秽掺杂进朋友交往中来的,而且这方面的警句格言也非常多,比如“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¹¹⁾”;“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¹²⁾”;“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¹³⁾”。只有以天道德行而结交的,才会在贫穷灾祸面前更加团结互助,增进友情。正所谓“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¹⁴⁾”。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晁衡之间的友情就是这种“清纯”的典型。对于他们的故事,很多日本人都熟悉。这是因为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是当时日本最优秀的遣唐留学生。他十九岁来到唐朝,学业期满后科考及第,被唐玄宗留下和李白同朝为官。由于两个人志趣相同,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晁衡56岁那年,日本遣唐使给他带来了老母亲的问候,晁错闻听大哭,遂第二次请求归国尽孝。唐玄宗很感动,尽管不舍,还是念其对故土和老母的一片深情同意了,并委任他为唐朝驻日本的使节,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能履任的外国人中国使节。晁衡走后,海上刮起了大风,同行二百多人,有一百七十多人遇难。消息传回唐朝,李白闻讯大恸,于是便垂泪写下了象征着中日友谊的不朽之作《哭晁卿衡》:“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获救回到唐朝,见到了李白和他的诗作后,非常感动。虽

然，晁衡最终还是没能回到他的祖国，但是他和李白以及其他的中国朋友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却在中日两国友好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最灿烂的色彩，并以他们那“君子之交”的高洁形象，为重视朋友关系的中国社会树立了不朽的典范，时至今日仍然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四) 要像水一样清明，意指正确认识和把握朋友关系，任何情况下都要头脑清醒、明白事理，绝不可丢掉原则或丧失理智。首先要注意，朋友是有远近亲疏的，不能把所有的朋友都看作是知心知己，心里要有明明白白的一本“花名册”，哪些人是一般的朋友，哪些人是必须亲近的朋友。对于正派正直、敢于直言自己的错误、志向高远、有学识见识的朋友，要懂得珍惜，加深友谊。但也绝不能因此而轻易伤害或抛弃一般的朋友。其次，要注意重视朋友共同性的同时，要充分尊重朋友的个性。任何时候都不能勉强朋友，特别是希望与朋友合作和求助于朋友时，绝不能强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要注意关心体贴朋友，尤其是关系最亲近的朋友，要把朋友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做，把朋友的家人当作自己的家人对待，随时维护朋友的利益。但是，在经济和资财方面一定要和朋友分清楚。虽说现在很多朋友还做不到像西方朋友之间流行的经济上的AA制，但是也一定会利用其他方式做到不沾朋友的便宜，不贪朋友的钱财。因此，中国朋友在请客送礼的场合往往会争先恐后（有时看起来像吵架一样），惟恐让朋友吃了亏，惹人笑话。如果接受了朋友的好处，一般都会记在心里，寻找机会回报朋友。第四，要注重朋友的以“忘我”为前提的“利友”性质，中国有一首著名的歌曲《朋友》之所以流行不衰，就是因为透彻地展现了朋友的这一本质特征¹⁵⁾。但是同时必须注意，绝不能为了利友而废德行，做出违反社会公德的事情，更不能为了利友而触犯法规。中国人普遍重视朋友交情，“友情为重”常常挂在嘴边，朋友遇到困难，特别是与他人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有些人为了帮助朋友往往会冲动，忘掉在友情之上还有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的界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朋友概念里，“利友”不是没有界限的，为了“利友”而越界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接受的。中国现在的影视剧作品里，描写朋友关系内容的很多很多。那些为帮助朋友而越界做出“缺德”和违犯法规的事情的，肯定都是被否定的负面形象。而正确理智地把握住朋友关系的当然都是正面形象，也是人们喜爱和赞赏的。比如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猎场》，主人公郑秋冬执着地追求理想，每在事业遭遇挫折，个人受到打击时，都会得到好朋友（如刘量体、葵大姐、林拜）得力得体的支持和帮助，最终走向了成功。这部电视剧所展现的郑秋冬与他的这些朋友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之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也很有典型意义。日本朋友要了解中国人的朋友关系，不妨可以看看，以为参考。

中国的好朋友之间的称呼很喜欢使用家庭称谓，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显得更为亲近。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血缘关系的表现。这一点，很多接触过中国朋友的想必都有深刻的体会。

三、同事关系

同事，也就是在相同职场工作的人。这个汉语名词，日语叫做“同僚”。现代汉语也有“同僚”一词，但与“同事”是有区别的。汉语的“同僚”现在主要是指在相同官场工作的干部，虽然也可以指相同职场工作的人，但这一职场一般都是官方的，而且人员也都是文职人员。然而“同事”却不同了，除了农村和军队等职场以外，在任何职场一起工作的人，包括普通劳动者，都可以称为“同事”。

中国人处理同事关系的原则，搜索一下网络，不难发现，众说纷纭，什么“三项原则”“四项原则”“五项原则”等等，不一而足，没有定论。但不管多少原则，有一点是共同，且毫无争议的，那就是“和合”。

“和合”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合”二字，就其词义本身而言，“和”，就是和谐、和平、祥和、温和、平和、和好、和睦，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的不偏不倚的持中、平衡、公正、中正；“合”是指融合、结合、合作、合力，就是多元的包容的存异求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人崇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最理想最完美的境界。

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常把孔子的“和为贵”¹⁶⁾挂在嘴边，这是很多学习汉语的日本人都知道的。“和为贵”中的“和”，实际上就是“和合”。因为孔子这里所说的“和”字本身就蕴含了“合”字所要求的开怀大度的胸襟和存异求同的智慧。以“和为贵”的原则适合处理社会所有的人际关系，当然也包括业缘关系中的同事关系，而且一般都认为是必须强调的。

处理人际关系的“和”的原则，用现代汉语简而言之就是“团结”。中国有一首歌曲叫“团结就是力量”被传唱了七十多年。毛泽东当年为“抗大”题写的校训¹⁷⁾，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把“团结”二字放在首位。这些都毫无疑问表明了“团结”对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时至今日，那一首歌唱团结的歌曲仍然还在中国被传唱着，毛泽东题写的“抗大校训”那八个大字，也仍然还被很多中国企事业团体当作内部管理理念沿用着，足以说明它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极高的社会价值。

如果说中国绝大多数的职场都会把“和合”或“团结”作为内部人际关系交往最高原则的话，那么为达到这一境界而必须要强调相互尊重以及相互协作顾全大局的团体精神，必然也就成了最重要的另一原则选项。这一点应该说与日本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日本人在进入职场后一般都会自觉地把团体精神放在首位，牢牢地把自己与职场捆绑在一起，即使个人受到了委屈，也不会选择舍弃团体于不顾。而中国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不会因进入职场而放弃自我的，如果与同事相处因不被尊重而受到委屈，只要突破了自己所设的心理容忍的底线，很多都会选择退出所处职场，“跳槽”进入其他职场。这也是中国人的“跳槽”情况为什么会比日本多得多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在此种情况下“跳槽”时，常常喜欢用俗语

“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来作为调侃。这种调侃，一方面展示了跳槽人的洒脱和幽默，但同时也因以倍受中国家人尊重的“爷”字作为自称，形象地显露出其对职场中的自尊极为重视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可以说是很有普遍性的。所以“相互尊重”，在中国人的职场同事关系中自然也就成了搞好内部互助协作和树立起团体精神的重要前提。

中国同事之间相处的第三项原则就是“等级”原则，这一点与日本是很相似的。但是仔细分析的话，还是有些不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吧。对于上级来说，下级有两种：一种是非直属下级，另一种是直属下级。对于非直属下级，中国的上级一般都很注意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过多地交往。如果需要某位非直属下级做些什么，也会通过其直属上级下达任务。如果与非直属下级发生矛盾冲突，一般也不会直接批评，而是通过其直属上级解决。中国人喜欢用家庭管理来比喻这种不同部门的上下级关系，“谁的孩子谁管”，意思对非直属下级是不应该插手管理的，否则便是越界，会被看作是对其部门领导的无礼、无视或不尊重。

所谓直属下级，汉语中比较确切的称谓是“下属”。作为上级，与下属相处，中国人普遍认为应该注意以下规范：①任人唯贤、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唯才是用。一个精明的上级，一般都深谙中国人才自古就有的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结。如果能够充分地了解并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不仅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获得下属的信任，而且对完美快速地完成本部门的工作也有很大益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理解的好上级，一般都会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了解下属的功课。只有这样，使用起下属来才能更得心应手，办起事来也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②公私分明、克己敬业、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好的上级，中国人觉得都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以高尚人品和道德服人。中国的下属对上级的品德道德是很重视的，如果领导忽略了这一点，就很容易被下属看不起，失去威信，有时甚至会和下属之间发生冲突。③融情于理、温和亲善、讲究工作艺术、关怀体贴下属。好的上级，在中国人看来都会懂得以爱心服人。如果作领导的只知道刻板地照章办事，而且在下属面前总要摆出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架势，说话很不客气，言行举止很不礼貌，那就会让下属很反感。当然，中国人并不是绝对地讨厌这种为官的架子，那些在照顾下属尊严的前提下端起的小小官架子，不仅可以彰显领导的权威，还可以增强作为领导的神秘感和魅力，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因此，如果不违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上级端着一点儿这种官架子，亲切地把下属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地去关心爱护，甚至把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下属工作心理和情绪的私人问题也当作自己的大事给予热情关注和帮助，那么肯定会极大地拉近与下属之间的心理距离，获得下属的拥戴，提高下属工作的积极性。④明辨是非、恩威并重、功过有别、奖罚公正。会做领导的上级，在中国人看来一定是有判断是非和决断功过的能力的，而且一般都会在效绩面前，甘心归功于下属和集体，在出现错误或失败的时候，又敢于自我批评和为下属担责。中国的下属，最讨厌那种有了功就“抢”，有了过就“让”的领导，也不喜欢那些对下属的功过是非视而不见，

即吝啬表扬，又不敢批评，浑浑噩噩的昏庸上级。⑤胸怀坦荡、大度开明、平等民主、一视同仁。中国人一向认为，心胸狭窄的人是最不适合做领导的，因为这样的人往往都以自我为中心，其心目中最完美的永远都是自己，做其属下，如果不甘于溜须谄媚，无论怎样聪明智慧、怎样努力勤奋，都不会获得赏识。如果做了这种领导的下属，除了同流合污之外，结局选项只有三个：要么自认倒霉、忍受下去；要么与之绝交、跳槽走人；要么向上投诉、拉其下马。现实中，这样的领导是最让人头疼的。因而，那些被称为具有“绅士风度”的、懂得欣赏自己下属的、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下属打交道，并且不拉帮结伙，不搞亲疏有别，不搞小山头、小宗派，面对有不同意见的下属也不搞歧视、打击、报复的领导，就成了做下属的最受欢迎、最敬佩的上级形象了。和这样的领导相遇并交往，中国人往往都会用“有幸”做出描述，可见中国人所赞誉的上级“绅士风度”多么受人重视和喜爱。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关系。对于下级来说，上级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非直属上级，一种是直属上级。对于非直属上级，做下级的一般也都刻意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遇到非直属上级要求自己配合做事时，理智的下级人员一般情况下都会委婉地请求让本部门直属上级知情，并申明由直属上级给自己下达任务。

如上所述，下级一般被直属上级背称或叙称为“下属”，而对直属上级，下属一般背称或叙称之为“顶头上司”。下属面对直属上级，过去一般都自称“属下”，以表谦卑。但是对于这一称谓，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含有放弃尊严的“自卑”心态，所以早已经被大多数人弃用了。

下属与上级打交道，中国人一般认为至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敬重。这种敬重，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是建立在对上级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正确认识上的。如果因为惧怕或者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对上级唯唯诺诺、甜言蜜语、阿谀奉承、行贿谄媚等，这在中国人看来就不是敬重了。对上级真正的最好的敬重，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现代汉语来表述的话，就是以下属的文明表现使上级感到特别的“有面子”。为此，中国做下属的一般都会努力做到——①在各种场合下都要认同和维护上级作为领导的权威，比如在上级出席的郑重场合自觉遵守和维护礼仪秩序，上级发言或说话时要认真倾听、不插话、不抢话，和上级出行或用餐等要礼让上级，对上级说话要注意言语得体等等。②认为上级的重要决策或想法、做法、说法等非常正确，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适当的场合以得体的方式或语言给予肯定和赞扬。③对上级的个人私事和个人忌讳不要表现得过于关心，更不能和他人议论上级的错误或弱点，但是如果在发现上级遇到了难题时，做下级的绝不应该装聋作哑，而应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帮助上级解忧。④在与上级发生矛盾时能控制情绪，不冲动，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顶撞上级，不能给上级“甩脸子”，即使自己是正确的，也要选择私下的场合和上级委婉地沟通，达到和谐一致，而且事后也不去传播，不给上级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注意服从。这一点和日本基本相同。但是中国人在认同下属对上级服从的同时，还极力主张“不盲从”，也就是说在有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不一定服从的。这就需要下属在接受

上级的指令时必须及时做出判断和选择。所谓判断，指向有二：一是“公事”还是“私事”；二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所谓“选择”当然也有两项：一是“服从”，二是“不一定服从”。判断与选择之间的联系，当然是：公事“服从”，私事“不一定服从”；正确的“服从”；不正确的“不一定服从”。选择“服从”的，很好理解，不必细说。选择“不一定服从”的，就很微妙了。因为“不一定服从”的选项中，也包含了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有限或有条件的。比如，上级指令下属为另一位同事解决一项个人的问题，这是私事，但有利于同事之间的团结，有利于调动该同事的工作积极性，那么这位下属就可以在与上级达成时间、财力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一致的条件下去完成指令。“不一定服从”选项中的另一种解释当然就是不服从。但是，选择不服从并不是抗拒，它最好的境况是通过私下场合委婉地与上级沟通以达成指令被解除，因此是很需要智慧和技巧的。如果直接拒绝上级，次数多了，很可能被上级戴上“刺儿头”、“杠头”等各种帽子，那可就是做下属的悲哀了。因此，中国人做下属的，在与上级相处时一般都会有应对拒绝顶头上司的心理准备。

第三，注意勤快。这个“勤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中“勤”的现代版，当然主要是指做事积极，也就是不管领导在不在场都一样，不仅有一定独立工作的能力，而且速度快、效率高。但是除此之外，中国人一般认为还包括——①勤学。也就是不断地学习钻研业务，学习前沿性的知识技能，学习先进的经验方法，优秀的行业典型榜样等等。②勤思。就是多动脑子思考，不仅能通过思考充分理解上级的每一项决策和指令，还能不断思考怎样更好地完成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等。③勤请示。做下属的做事要果敢有担当，这是当前很流行的说法。但是因为上级的责任是统领全局，对下属的每项工作必然有全局性的考虑。因此，作为下属的在工作中必须要保证随时向上级请示，才能使全局性的工作协调起来。私下接受指令做的事情，也同样。④勤汇报。不仅要及时向上级汇报负责事项的进程，还须汇报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对解决问题的思考，以使上级及时地掌握下属的情况，并能及时为下属提供支持和帮助，保证全局工作顺利。⑤勤献策。中国人一向认为，凡群体性的工作只有依靠“群策群力”才能做好。因此，作为下属，能在和上级的相处中勤于献计献策是最受欢迎的了。前文所言的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在这里也同样适用。

第四，注意谦虚。所谓谦虚，也是中国自古的美德，人们素来赞赏的“谦谦君子”¹⁸⁾就是指严格坚守谦虚美德的人。谦虚与谨慎是相辅的，它们的对立面是骄傲和狂躁，因而谦虚的品格往往都会被中国人具体化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人要这样，做下属更要这样，为什么？中国古代儒学主要经典之一的《尚书·大禹谟》中有一句“满招损、谦受益”说得非常清楚，毛泽东后来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也就是这句话的现代版。事实就是这样，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做下属的没有哪个会认为骄傲和狂躁比谦虚和谨慎更会受人待见，更容易上进和发展的了。为此，聪明的下属一般都会这样——①在与上级打交道过程中经常反思，总结经验，特别是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要有基本的认识，以使今后做得更好。②有了错误，

要学会自我批评,更要乐于接受上级的批评,要学会站在上级的角度看待问题,即使自己有委屈,也不能意气用事,为自己的错误争辩。③努力争取成功,做出成绩,但要学会把功劳和成绩视作过去,眼睛永远面向未来,绝不居功自傲,更不能与上级和同事争功。④在上级面前的言谈举止要注意控制,不能夸夸其谈,目中无人,表现得过度自信等等。

第五,注意张弛。“张”就是紧张、严肃、郑重,“弛”就是放松、活跃、活泼。做下属的,在和上级相处中当然要注意“张”的一面了。这是工作的需要,谁都明白。但是,中国人都知道,适当的“弛”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但工作中有时需要用“弛”来调节一下,工作之余就更无须说了。我们在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做下属的在适当的时机和上级开个玩笑,或者私下里张罗着给忙碌的上级办个生日聚会等等,这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很正常的。做上级的当然也很喜欢与这样的有张有弛、张弛适度的下属一起共事了。

除了上下级之外,平级的同事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日本的平级同事关系是有“先辈”“后辈”的等级之分的。中国虽说没有这种严格区分,但是事实上也存在着资历、资格和工龄长短区别的。一般来说,年纪大的、工龄长的、获得过奖励的、工作技能优秀的,在同事关系交往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特别是那些“师徒”关系的同事,做“徒弟”的一方因在入职之初接受“师傅”教导之恩,一般都会终生像对家中长辈或兄长一样的敬重、感恩、报恩的。这一点与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师生”关系没什么不同。

除此之外,中国人平级同事之间一般都很重视诚信和协作,这是个重大原则,凡违反者,一旦被发觉,必然会受到谴责,严重的甚至会丢掉工作。这一点与日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中国很多职场的平级同事之间似乎都有很浓的类似血缘关系的亲情味道。彼此之间喜欢使用家族称谓,比如“李叔”“刘哥”“张姐”之类的。这是因为中国人一般认为同事之间在职场中类似于血缘关系相处,更能增强团结,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日本人一般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同事之间相处一般不会主动自曝隐私的。但是中国人就不同了,很多情况下相互之间说说家里和个人的一些私密的事儿,不仅表明彼此的信任,拉近情感距离,有时还可以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疗伤”“解压”,甚至还会得到同事之间的帮助。如果一个中国人在职场中,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不跟同事谈一点儿诸如男女朋友、家里老人、爱人、孩子等方面话题的话,那在同事们眼里就很可能是一个怪人,很难得到同事的亲近。对于中国平级同事之间友好相处的这一特征,相信很多日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或影视剧故事中已经注意到了。

四、主客关系

业缘交往的主客关系与亲朋好友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主客关系是不同的,它是以职业行为为纽带而形成的。这种主客关系聚焦于职业目的,在不同的情景或场景下是可以角色互换的。一般来说,以职场为交往背景的,职场所属一方为主方,对方为客方;以公共场所为交往背景

的，交往的发起者为主方，受邀者为客方；以供需关系而论，供给者为主方，需求者为客方；以服务关系而论，提供服务者为主方，接受服务者为客方；以商务交易而论，经销者为主方，消费者为客方；以私人场所为交往背景的，场所所属者虽说是地主，但如果在这种交往中属于被服务者或消费者等身份，那也应该是客方。

业缘交往中的主客关系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独立的行业或社会组织外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团体与团体关系。另一类是行业或社会组织与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是服务机构或生产经销企业与被服务者或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类关系，他们所遵循的交往道德规范都是一样的。

对于业缘交往中的主客关系，中国古代一直将其称为“宾主¹⁹⁾”关系。“宾”在现代汉语中就是“客”的意思。古代中国人在构词顺序上之所以把“宾”放在“主”的前面，毫无疑问是以礼仪秩序为坐标的。“宾”原义就是受尊敬的、尊贵的客人，因而理应放在“主”的前面。现代汉语在表述郑重的礼仪场景中也常常使用“宾主”结构的词，但“主客”一词在交际文化的言语行文中出现频率也很高，这大概是因为现代人认为在这样的主客交往中，如果以道德规范为坐标的话，理应对“主”方的要求更先于“客”方并且更多和更高些吧。

中国传统文化对业缘交往主方的道德要求主要集中在对待客方的“恭”²⁰⁾字上。“恭”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被认为是“仁”的首要道德规范，用现代汉语来说，也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敬重。这一点应该说具有普世价值，至今毫无变化，与日本也是相同的。现代中国人很喜欢用“好客”一词来形容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这个“好”字除了含有日语的“喜欢”意思之外，还含有对客方热情、欢迎、真诚、喜爱接待等意义，其基点就是出于对客方的“恭”。

“顾客就是上帝”，这是西方业缘交往最流行的话语之一，近二、三十年来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业界也流行了起来。中国人虽然大多数都不信仰“上帝”，但谁都知道，这个“上帝”只是顾客有崇高地位的比喻。在传统的中国人的心里，主客关系中的客方地位也是很高的，只不过由于中国人一向认为最尊崇和最亲近的人莫过于供养自己吃饭穿衣的父母了，因此前文在论述“官民”关系时所言的“衣食父母”就成了很多中国人对客方地位表述时的代喻了。中国有一位已故相声语言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想必日本的“落语”和“漫才”界的艺术家们都很熟悉。他在临终前的1993年2月1日的晚上嘱托家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给听众、观众的《最后的话》中就说：“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侯宝林先生把喜爱他的相声艺术的听众和观众比喻成“衣食父母”，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应该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业缘交往中“以客为尊”观念最具中国特色的语言表现。

但是，也许很多日本人，包括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种“以客为尊”的业缘交往传统之道在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共和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也就是所

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流对业缘交往中的客方并不是这样认识的，在“阶级斗争”和“反对剥削”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主客关系之间的地位完全被颠倒了，主方奇怪地成了高于客方的提供劳动成果的人，客方则成了低于主方并享受主方劳动成果的人。比如去商店买东西，明明是等价交换的行为，却好像是顾客不放下身价去请求商家服务就不该顺利获得商品似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顾客购物要向商家一方表示感恩和真诚道谢的社会怪象，至今一些中国老年人在购物后仍然保持着向商家道谢的行为就不能排除是这种怪象的遗留。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礼节，一种文明的表现。但是，如果社会主流认为客方就应该把主方摆在尊上的位置，主方也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被尊重，那就是一种不正常了。这一关系倒挂的奇特景观，当然与那个时代生产力落后，物资极大的缺乏有很大关系，但是笼统地反传统文化传统的思想逆流的影响也应该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好在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业缘交往中主客关系才终于回到“以客为尊”的正确轨道上来。如今，我们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影视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中国的主客关系从交往的礼节上看似乎与国际上已经没什么不同了。当然，除了一些细节上很多场合都保持了自身特色之外。比如，中国人待客喜欢敬茶、敬烟、敬酒。对尊贵的客人，主人要离席到客人面前施礼。给客人斟茶要斟5~7分，不能斟满，否则就是驱客。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生气了的主人招呼手下人给客人“满茶”的情景，其意思就是在向客人表示“我不欢迎你，你可以走了。”中国的主人在知道客人有吸烟的习惯时，一般都会给客人准备香烟，并在适当的时机给客人敬烟的。最尊贵的客人，主人还会亲自为客人点上香烟。这个礼节，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高的反对吸烟的呼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城市中很多公务场合都已经取消了。但是在民间，尤其是在乡村，还依然保留着。关于敬酒的礼节，中国人一直都很重视，从古至今，似乎越来越讲究。除了外交和重大的公务场合之外，大多数民间场合，中国的主人都喜欢在业缘交往中用中国特有的白酒来招待客人。主人向客人敬酒时，也都讲究“先干为敬”。也就是碰杯之后马上在客人面前先把自己杯中的酒喝掉。这一礼节，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都很不理解。中国人对此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样做是为了表达敬酒人的真诚。当然，客人也可以如此给主人敬酒。但是，每一次的敬酒，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中国人都喜欢说明一下敬酒的理由。因此很多需要在交往中解决的业务方面的问题，就会很自然地在这样的交杯换盏中提出来解决。所以，中国人的业缘交往中的“宴请”，除了必要的礼节性缘由和加深情感关系的目的之外，很多都含有较浓的业务信息交流或交易、谈判的色彩。

另外，中国人在业缘交往中还习惯把客方分为“熟客”与“生客”两大类，这也是很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之间具有一定美好情感关联的社会，也就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提出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是相对的。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人们信奉“熟人好办事”，因此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规和

契约等很容易被弱化、轻视，甚至被无视。因此有些舆论便认为注重情谊的“熟人社会”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只有瓦解和终结“熟人社会”，努力建成一个“陌生人社会”，社会才会在契约、法规逐步完善中走向成熟和发展。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社会学关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是不是如此对立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在业缘交往中很重视“熟客”这一传统，事实上不仅至今毫无变化，而且在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法规和契约的认识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的情况下，还在不断的加强提升。中国的主方都十分重视和尊重“熟客”，当然是因为“熟客”可以带来稳定的效益、绩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客”必定会被主方轻视慢待。相反，对于任何明智的主方来说，有“生客”往来都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他们不仅象征着主方业务的发展和活力，更是主方业务活的广告，而且未来还很可能也会成为“熟客”，因此“喜迎”和“善待”生客就成了主方不二的选择。

当然，“熟客”与“生客”在中国社会的业缘交往中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主客双方“熟”的程度越高，情谊的程度越深，在交往的礼节表现上就越是拘泥，不客气。而主客关系生疏，就会相反，双方都会表现得很客气，很多时候还会很拘谨。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如果客方是“熟客”，那么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因为“熟”所产生的情谊在主客双方之间有很强的稳定器或润滑剂作用，即使发生一些矛盾也极有可能被情谊所化解。但如果客方是“生客”就不好说了。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生疏，缺少了情感的约束，一旦发生矛盾就很容易引发侥幸心理和冒险的冲动。因此，主客关系发生激烈冲突一般以客方为“生客”者居多，也就成了中国业缘关系一种特殊的现象了。当然，这种所谓的激烈冲突一般都不会冲破法律底线，大多都表现为不顾公共道德的相互高声叫骂和羞辱。但这毕竟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光彩的事情，特别是由于不遵守相互尊重的原则或违背制度、规约而引发冲突的一方，事发后所造成的后果，轻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严重者，恐怕就很难描述了。这方面的教训，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应该说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当然，无论如何，业缘交往的主客双方不管熟悉或生疏与否，哪一方都是不希望发生矛盾冲突的。正因为因此，所以一般情况下，中国的主客双方交往时都会很小心谨慎。特别是客方，为了交往的顺利进行，一般都会选择“客随主便”作为重要的原则。

“客随主便”，也就是客方愿意按照主方的意愿和安排行事，这其中当然充满了客方对主方的信任，一般适用于客方出现在主方所属或选择的背景下。但是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和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电商和网购的出现与盛行，使主方对客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于是这一原则便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失去了必然性。现在的中国，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一群穿着工作服骑着载满货物的电动车在大街小巷穿梭的人，他们就是现在中国媒体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快递员”，也就是专门为电商给网购者送货的体力劳动者。“快递员”是现今中国公认的最忙碌的群体，他们为满足网购者对货品送达时间的快捷要求，惜时如金地奔跑，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意，因此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快递小哥”“快递姐姐”。当然，他们称呼中的那个“快”字

以及那匆匆忙忙的身影也很清楚地显示出了客方网购者的要求对于主方电商的重要程度。另外，随着中国网络购物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加强，电商对于网购者购物后给予的可记录和公开的网评也越来越重视了。对于电商来说，每次出货后如果能获得好评，可以带来效益，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获得了差评，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很难估量并且很可怕的了。因此，为了避免出现差评，中国的电商往往都会千方百计地满足网购者的意愿。如果网购者因为不满意而给了差评，有的电商为了让网购者删掉差评，除了利用网络平台与网购者协商解决之外，甚至还会让店员或自己亲自登门向网购者道歉。可见，“客随主便”的原则，在网购的主客交往中事实上早已经被改写为“主随客便”了。

五、临时关系

这种关系是指社会生活中因某种相同的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性的关系。比如同一旅行团中的游客之间，同乘一种交通工具的乘客之间，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行人之间，在同一家饭馆吃饭的食客之间，在同一家医院看病的患者之间，在同一公共场所办事、买东西的顾客之间等等。

临时关系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它的特点是松散自由。相处时，大家彼此客客气气，分开后，一般也不再往来。这一点，中国人和外国人没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彼此的空间距离近一点，接触的时间长一点，或者因某种意外而使彼此交集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这种临时关系就会显示出与众不同来了。

中国人和陌生人相处，一般是很重视“缘分”的。所谓“缘分”，本是佛教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和道家文化中是没有的。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无形连结，使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相遇的机会和巧合以及后来的相处都是一种必然，是命运的安排，就像基督教众和伊斯兰教众都相信人们的关系都是上帝和真主安排的那样。但是，中国人所重视的“缘分”观念，除了自由结合的姻缘关系，一般很少用于熟人，而多用于陌生人。“缘分”在汉语中不含有任何贬义，把它用于陌生人之间，比如称与对方的相遇是因为有“缘分”，这样就会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所谓的“缘分”，看成是一个有着奇特功能的，可以使临时关系的陌生人轻松愉快地进入熟人圈子的社交用语。

也许很多跟中国人接触过的外国人在初次使用“缘分”这一社交用语后都会感叹它的神奇力量，但其实它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魔力，主要还是在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重视结交朋友的性格。正是因为如此，因而在社会生活的很多临时相处的场合里，中国人往往都会表现得很主动热情，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建立一种准朋友关系，以便在需要时可以相互支持和帮助。

临时关系的中国人相遇，在靠“缘分”化解掉陌生的氛围之后，首先开始的对话往往是相

互提问，比如询问对方的姓名、籍贯、故乡、学历、职业、毕业的学校、专业、职场所在地、职称、爱好，甚至家庭情况、生日、婚姻状况等。这些问题，对外国人来说大多都属于隐私，这一点很多中国人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人之所以还在问这样的问题，其真实的目的并不在于问题本身，或者是窥探他人的隐私，而在于通过问题寻找自身的位置和共同的话题，以方便建立和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如果知道了彼此是同乡，或是同姓，你们之间便会根据各自的年龄、辈分使用起家族称谓，并且很快会变得亲密起来。因此，在与中国人交往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外国人大可不必惊讶甚或反感，你不愿回答的问题，只要说声“对不起，不好意思”，中国人一般不会继续追问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可以多向对方发问，主动去找你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和彼此的位置，只要做到不冷场，不尴尬，就可以。

“缘分”的观念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正能量，它不但可以轻松地使临时关系双方由陌生转向熟悉，还可以在彼此出现激烈矛盾冲突时，快速地使双方冷静下来，走向和解。比如，两个人乘车时发生了争吵，只要有其他乘客温和地劝一句“两位别吵了，咱们能坐在同一辆车上就是一种缘分啊”，争吵的双方听了，一般都会知趣地平息掉心中火气的。因为没有人会否定这种偶然的交集不是一种缘分，而有缘之人相互礼让、善待和宽恕是最基本的道德，如果不遵守这种道德，就会成为人们耻笑的“缺德”之人。谁会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

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缘分”的能量再大，它也仅仅是为临时关系的陌生人提供的一个轻松相识和友好相处的欣悦理由。临时关系究竟怎样相处，关键还是要共同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临时关系的交际要遵纪守法，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相同的，但至于遵守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应该说国度不同就会特色各异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很丰富，对于临时关系的人际交往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了。

“礼义廉耻”出于《管子·牧民》，毫无疑问属于儒学文化，相信大多数日本人都都很熟悉。它之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被树为“国之四维”，是因为它适用于社会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交往，被认作是社会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文明素质，只要人们都懂得并自觉遵守四项道德规范，国家自然就会安定，社会自然就会和谐。

“礼义廉耻”的表现在中国无处不在，临时关系的人际交往更是如此。首先来谈谈“礼”字。“礼”用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重视和遵行“礼数”。指对他人要温和、恭敬、谦让、有礼貌、遵行以和为贵的敬老爱幼、等级有序、男女有别以及民族的、民俗的、地方的礼节礼仪等。临时关系的交往，从相遇开始直到分别结束，人们都非常注重这种德行。比如和老人打招呼要先叫一声“大爷”“大妈”，招呼孩子要先叫一声“宝贝”或“小同学”“小朋友”，招呼年轻人呢，当然是不管对方长得怎么样，男的都叫“帅哥”，女的都叫“美女”。走路、坐车等场合，要注意礼让和照顾老幼病孕。和少数民族在一起要注意尊重民族的语言、信仰和生活习惯，不能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提“猪”字，不能和他们的异性握手等。与方言差别较大的人

员相处要注意尊重对方独特的行事方式与生活习俗，我们在旅途中经常听到不同方言人们之间在热烈地交谈各自地方的禁忌，这在汉语里叫做“问俗”或“问禁”，实际上就是在为他们往后的相处做尊重彼此“礼数”的心理准备。生活中，中国人的临时关系交往是非常重视“礼数”的，忘记了这一点很容易造成交际障碍或冲突。笔者就曾经亲眼目睹过几次骑着车或坐着私家车向路人问路被拒绝的尴尬情景，原因很简单，都是问路者要么是语言不当（没使用礼貌的称呼），要么是举止失礼（没有下车），违背了最基本的“礼数”规则。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义”字。“义”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仁义、正义、道义。也就是指公正的道理和遵守、维护这种道理的坚定、勇敢、正直的行为，忠诚守信，乐于助人，不见利忘义等。正常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相互关心帮助，比如搀扶老人过马路，帮助走失的孩子找妈妈，下雨天给街头执勤的民警撑把伞，寒冷的冬天给辛勤工作中的环卫工人捧上一壶热茶等等，这些善行在日常中随时可见，都是“义”的表现，而且也是令人赞赏和值得提倡的。但是如果比较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非正常的突发的意外情况下“义”的表现，往往更受中国人的注重，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义”的表现虽然同样都是维护正义帮助他人，然而难度较大，需要当事人的判断和反应的速度快，而且还需要拿出足够的勇气，舍弃个人利益，甚至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才能实现。因而备受中国人的推崇，认为唯此才是“义”的最崇高最完美的境界。这也正是儒学圣人孟子之所以发展了孔子的“杀身成仁”的学说，提出“舍生取义”，并将“义”确立为人的最高道德品质的意义所在。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的那场大地震，当时灾区许许多多不相识的人，在亲人失联和余震不断的境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地救助他人，全国各地的许多青年也自动组织起来奔赴灾区做义工，捐资捐物，照顾灾区的伤员和老幼病孕。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危难时刻勇于帮助他人的人，在中国绝不是个别的，在类似汶川地震的大小灾难中每每都会成批成批地涌现，很多人甚至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但是却都成了人们心中义字当先的典范，见义勇为的英雄，受到社会普遍高度的赞誉。当然，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上也有薄情寡义的人，人们往往称之为“小人”，他们见到了他人受苦受难往往会唯恐避之不及，更不用说出手相助了，这样极端自私的行为，无论有什么无奈的理由，一旦被媒体曝光让他人知晓，都会立刻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有人会出于义愤，在网上对其人肉搜索，让其不得安生的。可见中国人对“义”之品德的推崇和对“不义”恶行的憎恶程度。

毫无疑问，“义”的表象一般都是助人的，但是助人是不是肯定就是“义”了呢？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回答“不一定”。因为在中国人的心中，真正的“义”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合乎法规，合乎情理。这就需要助人者在出手相助他人之前对“该不该相助”和“怎样相助”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否则便会“出力不讨好”，甚至造成错误。比如，前不久一些中国游客在国外机场被困，有的游客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之前，仅凭直觉就做出了受到歧视的判断，因而激发了很多驴友²¹⁾的爱国主义情绪，使之相互支持协作，采取了高唱国歌、呼喊口号、把不完整确切的冲突视频上传到网上等手法向机场和航空公司方面施压。事件发生后，这

些游客本来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爱国义举，会赢得国人的赞誉，但没想到经过中国领事馆出面调查后发现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做法也是不合时宜的，结果回国后受到了社会舆论严厉的批评，一致认为他们的行为非常丢人，给中国游客在国外的整体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再比如，我们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看到过几则不孝子女路上虐待老人反遭路人痛打的报道和视频，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²²⁾的暴力助人行为，虽说赢得了很多网友点赞，但由于助人的手段已经涉嫌违法，也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取，与真正的“义”的品格是有差距的。但是在看到社会不平之事，将其摄录下来上传到互联网曝光，让舆论评判和有关机构处理，这种手段效果却很好，受到了普遍的肯定。比如，前不久有两个有关高铁乘客无视社会规范和道德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上引起了社会轰动。一是一位年轻的妈妈为了等迟到的丈夫上车而带着孩子堵住车门阻止列车启动，二是一位在读男博士不听列车长的劝阻无理霸占一位女乘客的座位。结果两位视频中的主角都受到了舆论的谴责和相关机构的严肃处罚。显然，这两个视频的摄制和上传者也都是高铁乘客，他们之所以采用媒体曝光的手段来惩罚破坏高铁正常秩序的人，其目的就是想维护更广大乘客的利益，虽说这种手段看起来并没有像古代侠士那样英勇无畏、豪气冲天，但从其产生的力量和结果来看，却无疑显得更现代更智慧更有效，也更具有“义”的精神品格。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廉”字。“廉”是指廉洁，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不贪求功名利禄、金银财宝，不贪占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利益，大公无私。从字面上看，这项道德要求似乎用于公务员或职场人员更为适合。这种认识当然正确，但社会生活的临时关系交往中也是很需要的，并且表现得很普遍。比如旅行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驴友”们一起吃饭后都争着付费的情景，初次见到这种场景的外国人一般都会表示不解，即便是见惯了这种场景的外国人也会以为这只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习惯。其实这正是“廉”和“耻”的道德作用的一种表象。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品德高尚的人是不能贪占他人便宜的，使人以为自己喜欢贪占他人便宜不仅会失去很多朋友，还会影响到个人的品格形象，是非常耻辱的。由此才会生发出食客们争相付款的景象。诸如此类，比如帮助他人不求回报，不以收受财礼为条件，不夺他人所爱，不受礼不还，不恨人有笑人无。一句话，包括临时关系的所有人际关系交往，人们都希望做到内心纯净，行为清白。

最后谈谈“耻”字。“耻”就是知耻。指重视个人名节以及与个人相关的家族、民族、国家的名誉，自尊自爱，懂得三思而后行的道理，绝不作违背良心或损害家族、民族乃至国家名誉的令人耻笑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一切违背社会法规、道德和礼数的言行都是耻辱的，一旦为人所知便会有损尊严和名誉，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信誉和空间。因此，人活着就必须懂得和重视这一点。用现代白话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要“爱面子”。中国人常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就是讲的“知耻”胜于生命的重要性。但是生活中，什么是“耻”，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衡量方法和标准。比如，现在的女孩子喜欢穿透视或露体时装，老年人

看到了,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就批评其“不知羞耻”,这样很容易造成交际冲突。临时关系的交往,中国人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使对方产生“不知羞耻”的感受,同时也会注意不要以自我为标准,轻易给他人言行作出“无耻”的评价。中国人非常痛恨刻意踏破人格底线的人和事,一旦遇到,很多人都会忍不住用“不要脸”“可耻”“恬不知耻”“厚颜无耻”“寡廉鲜耻”等詈语痛骂。可见“知耻”在中国人际交往中的重要。

另外,临时关系的中国人在相识之后的分手时,一般都会说“有事儿联系啊”。如果彼此没有留下电话或者微信号码,这也只是一句礼貌性的客套话。虽说没有什么实践意义,但说出来会显得热情亲近,听的人一般也是姑且一听,不会较真的。这一点也须注意。

六、结语

关于中国人业缘关系交际的话题,我们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文主要讨论了“朋友”“同事”“主客”和“临时”等四种关系。关于朋友关系,我们比较了古今不同的概念。从现代意义的朋友概念出发,把朋友分为了八类,并指出中国结交朋友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仍然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以及“忠恕”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德规范。

关于同事关系,我们指出处理同事关系的最高原则就是“和合”二字。“和合”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人崇尚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关系最理想最完美的境界。另外,团体精神和等级原则也是处理同事关系不可忽视的。上下级之间和平级之间的交往中对这些原则的表现非常充分。

关于主客关系,我们指出他们之间在不同的场合虽然是可以角色互换的,但无论怎样互换,传统观念的主客关系原则都集中在主方对客方的“恭”字上。用现代汉语表达,客在西方被称为“上帝”,在中国就是“衣食父母”。“以客为尊”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客在中国虽然分为“熟客”和“生客”,但这并不表明主方不喜欢生客,事实上正相反。中国还有“客随主便”的传统,但这只是表现了客方对主方的尊重。

关于临时关系,中国人重视“缘分”观念,主要是为了拉近彼此的关系。临时关系究竟怎样相处,关键还是要共同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很丰富,对于临时关系的人际交往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了。

外国人和中国人交际,当然主要是业缘关系。所以,业缘关系所体现出的中国交际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上关于中国业缘关系交际的讨论,虽说远不够细致全面,但仍然希望能对学习汉语并希望使用汉语和中国人进行业缘关系交往的日本朋友有所助益。

注释

- 1) 参见爱知大学语学教育研究室《言语与文化》第38号笔者拙文《关于中国人的业缘关系交际(上)》，2018年3月发行。
- 2) 出自《论语·季氏篇》。
- 3) 出自《论语·学而》。
- 4) 也有人把此处的“不亦乐乎”解释为“难道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
- 5) 所谓“五伦”，也就是我们在前几篇论文中描述过的中国古代儒学文化所归纳的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五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这五种人际系统称为“人伦关系”，包括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因而又称为“五伦”。
- 6) 出自《增广贤文》。
- 7) 出自唐代韩愈(公元768-824)《赠崔立之评事》。
- 8)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 9) 据载，自宋代以来，载入史册的钱氏名人已经逾千。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中国人所熟知和敬重的钱穆、钱玄同、钱钟书、钱伟长、钱学森等，都出于这个家族。
- 10) 出自《论语·子张》。
- 11) 出自《史记·郑世家》，意思是“以权势和财利而结交的，一旦失去权势和财利，友情也就疏远了。”
- 12) 出自《战国策·楚策》，意思是“以钱财而结交的，钱财没有了，友情也就断绝了。以美色而结交的，美色失去了，友情也就变质了。”
- 13) 出自《庄子·山木》，意思是“以利益而结交的，一旦遭遇穷困灾祸就会相互抛弃。”
- 14) 出处同上。
- 15) 歌曲《朋友》(臧天朔演唱，黄集伟作词)的歌词是这样的——“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
- 16) 出自《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用现代汉语简言之，就是“礼的应用以求和最为珍贵。这是过去开明的君主最好的治国之道。”
- 17) “抗大”是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毛泽东于1937年4月为其题写的校训。
- 18) 出自《周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 19) 如《礼记·乡饮酒义》：“乡人士君子，尊于房中之间，宾主共之也。”
- 20) 中国传统儒学文化提倡的“仁”的五种道德规范“恭、宽、信、敏、惠”的第一项。出自《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 21) “驴友”，谐音词，即一起旅行的朋友。参见本文“朋友关系”一节。
- 22) 这是由著名歌手刘欢主唱的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曲的一句歌词。这首歌在中国很流行。

主要参考文献

- 王德有、陈战国 主编《中国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年2月第1版
- 汤一介、张耀南、方铭 主编《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
- 王宁 主编《评析本白话十三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3年2月第1版
- 陈戌国 编著《礼记校注》岳麓书社 2004年5月第1版
- 杨威 著《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版
- 张燕婴 译注《论语》中华书局 2006年9月第1版
- 喻怀澄 编著《历代名言佳句欣赏词典》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年10月第1版
- 武冈子 主编《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1月第1版
- 常建华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 王春瑜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交谊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 胡戟 撰《中华文化通志第5典·礼仪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 易中天 著《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1版
- 曹德本 著《中国传统化理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年6月第1版
- 秦弓 著《中国人的德行》华龄出版社 1997年5月第1版
- 孙荪 主编《论中国人现象》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7月第1版
- (美国)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 Jansen)著《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 刘忠信 主编《社交大全》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版
- 李元授、郭友鹏、杨智敏 著《交际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1版
- 黄钊 等著《中国道德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4月第1版
- 乔继堂 著《中国人生礼俗大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年3月第1版
- 杨志刚 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1版
- 张岩松 编著《现代交际礼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5月第3版
- 贾玉新 著《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年9月第1版
- 王福祥、吴汉樱 编《文化与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年4月第1版